

---

#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现代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罗卫东

**【提 要】**本文从现代化的发动方式、动力机制、产业和区域推进模式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文章认为,浙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导向的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现代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发动方式;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引发的活力和效率为主要动力源;以轻低小集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推动现代化的主导产业以及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辐射现代化的区域发展模式。面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浙江下一个阶段还必须解决战略定位、再创体制优势、政府功能转换、人才资源开发与聚集、技术支撑条件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关键词】**浙江经济 现代化 区域经济

浙江的现代化进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是区域现代化取得较大成效的典型,因此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价值。本文试图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对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并以此为基础对下一阶段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

## 一、如何定义现代化

关于现代化,我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去定义,一是把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来看的定义,另一个是把现代化作为结果来看的定义。

### (一)作为过程的现代化

亨廷顿教授总结了学者们关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上一致的看法。大多数作者或明或暗地提出了现代化过程的九个特征:(1)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2)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3)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5)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6)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7)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8)现代化是不可扭转的过程;(9)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sup>(1)</sup>。我们同意亨廷顿教授对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来看的基本特征的表述。虽然我们不能就这些特征在浙江的表现一一加以分析,但是大体来看,浙江的现代化也是符合这些特征的。

### (二)作为结果的现代化

作为结果的现代化,简单说来就是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或称为现代化社会。那么什么是现代性社会或现代性社会?

杨豫教授指出<sup>(2)</sup>,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中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

现代化的实体含义究竟是什么?台湾学者张玉法<sup>(3)</sup>认为可以从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加以阐述。

---

**作者:** 罗卫东, 1963年生, 浙江大学教授、人文社科部部长。(杭州 310027)

---

从深度来说,现代化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层为物质层次,包括工商业、交通建设、大建筑和各种新产品;第二层次为制度层次,包括行政组织、司法机构、教育制度、银行等等;第三层次为思想与行为层次,包括求效率、讲变化、重人权等。

从广度来说,现代化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主要是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

尽管现代化有多个方面的表现和特征,但是,基本的、关键的内容还是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起因又是工业化。所以学术界多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始发原因,或者说,现代化是工业化的最终结果。

### (三)本文的观点

我们把浙江现代化进程理解为首先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而经济发展是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三个过程有机结合的一体化过程。其中,工业化在任何一个意义上都是现代化的核心部分,不仅是现代化在部门结构上的反映,也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现代性转变的基础,工业化为传统社会的人带来了全新的劳动方式和消费模式,是现代性的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那时的工业化在推进方式、持续性以及影响度等方面都无法与近 20 年所发生的相提并论;城市化在形式上是现代化进程的空间表现,城市化与工业化两者是现代化的两个密不可分的表现。

市场化,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对浙江来说更是如此。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其他地区相比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市场化先导。没有市场化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解放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革命,浙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进展的。对于中国这个长期处于反市场或压抑市场的经济体系而言,市场力量的解放与经济主体的人性的解放是同步进行的,市场的力量和货币的力量对于真正启动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西欧历史上,市场的解放早在重商主义时代崩溃的 17-18 世纪就成定局,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地位确立迄今为止已经近两个世纪。今天西方的学者只能从历史文献当中去寻找和认识市场化的过程,已经难以像中国的学者那样对市场化改革有如此深切的现场感。因此对市场化之于现代化的意义也难以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观点。另一方面,现代化理论对于国内的大多数学者又是舶来品,整套话语系统的全般接受妨碍了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现场分析。我们的学者中,相当多的人热衷于搬用西方现代化或后现代的概念系统、理论系统,没有给予本土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以必要的重视。这也是目前的有关现代化理论中较少有关于市场化问题论述的重要原因。

如果以改革开放开始作为浙江现代化进程的真正起点,而以 2020 年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志年份,那么,今天浙江现代化道路才走到中途,距离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要从理论上概括出浙江现代化模式,为时过早。但是,回顾迄今为止浙江现代化所走过的历程,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益的启示,分析认识浙江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得失对下一步发展极为必要。

## 二、浙江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特征

如果要对改革开放 20 年来浙江现代化进程作一个总体描述和特征刻画,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述,浙江现代化是以市场导向的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现代化。这个表述包含了浙江现代化进程的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从现代化的发动方式看,浙江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在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比较有限,惟其有限才使得浙江现代化道路的演进路径未被外部的行政性力量所阻滞;第二,从现代化的基本动力看,诱致型制度创新引发的活力和效率是主要动力源,这意味着浙江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内发性、自组织性和可持续性;第三,从推动现代化的主导产业看,轻低小集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这个特点使得浙江在全国率先到达了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点;第四,从现代化的区域发展类型看,主要线路是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辐射。

### (一)浙江现代化的发动方式

浙江现代化的进程到底是怎样启动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十分复杂。罗斯托在《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

的起源》这本著作中,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传统社会未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增长?”<sup>(4)</sup>从不可维持的增长转向可持续的增长类似于自然界的“相变”。现代化的启动是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相变”。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无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是直接的导因,但问题是,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内地省份的现代化进程则不如浙江。由此判断,浙江肯定存在着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存在的特殊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浙江现代化的条件的确是中国共产党新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长期计划经济造成的小商品短缺的市场结构。但浙江现代化的内因,则是浙江民间长期潜存着的物质利益冲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许多地区,地下包工队、黑市交易、长途贩运、高利贷等与当时的体制根本冲突,有着巨大风险的牟利行为就已经普遍存在。这是浙江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现代化进程从民间开出的根源。浙江的普通群众对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机会,有更主动迅速的把握。否则,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后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迅速崛起。浙江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又使得官员较其他地区更快地认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目标。越是基层官员越是在思想观念上与老百姓认同。这样,民间启动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很快就确立起来。

自下而上的现代化发动方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发动的制度创新逐步突破来自上面的文字或口头的限制,导致正规制度规章的不断改变或修订。例如专业市场和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就是如此。第二,民间自主解决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第三,民营企业逐步影响和改造了基层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取得了政治支持。第四,可能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浙江经济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是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按照严格的产权经济学的原理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评估,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早已经突破了50%这样一个公认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界限。这些方面共同指向了市场化。市场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间力量的重组。

为什么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驱动的改革在浙江成为可能,为什么滞后于现代化要求的各种自上而下的力量没有能够像其他地区那样有力地控制住民间力量的作用?是无法遏制,还是不想遏制?关于这些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一时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浙江省领导对待温州的态度看,似乎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有的时候这种因素为主,有的时候那种因素为主。

由于民间力量的旺盛和直取市场化利益的内驱力之强大,浙江地方各级政府对推进改革和推动经济主导的现代化只发挥了次要或者说从属的作用,不能高估。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一份评估报告对此作了量化。那么自上而下的力量又是如何影响浙江的现代化进程的呢?姚先国教授在“浙江经济改革中地方政府的行为”<sup>(5)</sup>一文中作了现象形态的描述。对政府部门逐步退出经济运行的原因也作了一定的分析。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分析没有看到更加深入而系统的文献。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历程的总体情况看,对于原发性的或内生性现代化来说,一个功能较弱的政府不是坏事,反而往往是件好事。就浙江这样一个省份来说,为什么会放弃国内其他地区对经济的强硬控制态度,转而采取较放任的态度,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对浙江这样的地方来说,民众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远远强于政治参与欲望,放任不可能带来政治或社会上的不稳定,反而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况且,作为地方政府,放任政策带来的社会或政治风险,可以由中央政府处理,二是浙江在国内不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省份,解放以后,浙江的官员也很少升迁到重要的中央部门担任要职。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得浙江的官员们的效用函数呈现较为明显的多元化倾向。对于中央政府和对于本省老百姓,浙江省的官员具有双重角色,对于老百姓来说,它是管理者,但是对中央来说,他是老百姓的盟友。因此,我的基本判断是,从省级主要领导到一般基层官员,较早就认识到对于民间力量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可以说,浙江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内逐步形成了有限干预的“政治文化”。这样的文化对浙江这样现代化先发地区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浙江的政府功能的缺位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但是在增长主导阶段,当政府不能做到合理的“间接性选择控制”时,与其全面的强化管理,不如全面弱化功能。

总之,浙江现代化在发动方式上的基本特点是民间力量主导,政府有限干预。与国内许多地方的情况不同,浙江现代化是内生的或者说是自发启动的。外部力量的作用是次要的。

## (二)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浙江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一进程得以持续展开,是什么力量使浙江现代化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回答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

无论是从经济含义还是从其他含义来说,浙江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创新。参与创新的主体,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或者说业主,也有基层官员。

用诱致性制度创新的概念来解释浙江的改革和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法,但是有人认定浙江的制度创新是需求导向的诱致性制度创新<sup>(6)</sup>,则是值得讨论的。这种说法不错,不过,没有哪一种制度创新不是需求导向的,即使那些被作为供给导向制度创新的行为也肯定是对某种制度需求的回应。因此,说浙江的制度创新是需求导向的固然没有错,但可能忽视了更重要的一面。在我看来,讨论浙江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创新的需求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却不能忽视一个更加重要或许也是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在其他地区也有同样的需求,却产生不了制度创新。关键在于对需求的反应,因此,需要考察浙江民间制度创新中的供给方面。诺斯、舒尔茨等人虽然分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但是没有涉及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对供给因素的分析是由拉坦首创的。拉坦认为<sup>(7)</sup>,制度变迁的供给与技术变迁的供给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如技术变迁依赖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一样,制度变迁则依赖于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或者说,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这就象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制度变迁完全依赖于产生了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新知识的正规研究。这一点也像技术变迁一样,技术变迁也并不意味着要求科学研究必须制度化、正规化。无论是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都起源于新的知识,至于这种新的知识是产生于正规的研究机构还是个别人的业余发明,这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大量的制度变迁并不来自系统的社会科学新知识,而往往来自政治家、官僚、企业家或其他人日常生活的经验性知识。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浙江有效地供给了适应需求的制度,从而是创新成为现实?可以断定,浙江的民间制度供给行为不是主要来自于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以下因素可能需要重点研究,第一,浙江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公共知识,为制度供给提供了“道德支持”,比如在温州,“永嘉学派”对赢利活动的肯定态度,解决了利润导向的制度供给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难题。这一点比其他省区领先一步。第二,浙江自古以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像专业市场这样的制度安排早在宋代浙江就已经出现,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民间的习俗,不需要从头构思。台州一带改革开放前早就存在的“打干股”为股份合作制的出现准备了知识基础;金华一带的农民数百年来鸡毛换糖的“习俗”也是形成专业市场的重要历史前提。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举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民间的制度创新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三,浙江人的文化禀赋和智力水平极为有力地促进了制度创新,像均瑶集团包飞机航线的举动,不仅显示了胆略,更显示了捕获商机的智慧。第四,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执行能力”,这是创新活动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一个制度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从头脑中的构思到现实的行为,要有果敢的举动和甘冒风险的勇气。第五,浙江人跨地区、省区、国家的流动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供给,特别是华侨多,分布区域广的特点,对创新是极为有利的。

从制度供给的决定因素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没有传统也就没有现代化。传统所形成的共同知识<sup>(8)</sup>是形成一种制度规范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所谓创新也不可能。但是制度创新一旦启动,传统的力量会发生意义上的转变。作为一种传承力量,逐渐退出创新活动,最终甚至转化为创新的阻力。制度创新的持续性是依靠路径依赖机制或制度联系效应<sup>(9)</sup>来维持的。

总而言之,与其说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机制是由需求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的,毋宁说是由供给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的。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领先优势或者平常所说的“制度落差”不完全是需求导向形成的,而是制度供给能力较强的产物。迄今为止,可以说制度供给能力决定着浙江现代化的动力。

### (三)关于浙江现代化的产业和区域推进模式

现代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更进一步说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浙江的现代化也不例外。农村工业化是浙江工业化的起始点,因

这也是现代化的起始点。工业化的必要性与浙江发展第一产业的条件恶劣密不可分。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浙江得到国家的投资或其他投入少得可怜。但是,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又必须通过非农化来寻求出路,这是改革开放前浙江发展的一对尖锐矛盾。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对矛盾无法找到根本解决的途径。因此,只有以体制创新为切入点来寻求解决区域资源约束的途径。于是工业化首先从农村地区开始,从体制创新力强的地区开始,从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开始。这是约束下的必然选择。从产业推进模式看,浙江现代化最初是从劳动密集型是加工工业起步的,随后逐渐地提高加工深度、加工规模和资本集约度。建材、纺织、小家电和其他小商品成为浙江经济的当家产品。虽然,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使工业结构突破了以上的行业范围,但是轻小低散的特点基本保留了下来,工业生产的集约度和集中度与沿海其他省市相比明显偏低<sup>(10)</sup>。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浙江的工业规模扩张很快,但是,结构未有根本变化。

从区域推进模式来看,思想解放快,旧体制打破较早的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其中以温州地区最有代表性,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东阳、义乌等地,绍兴地区等也属于此类。思想较为保守,对旧体制的依赖性较强的杭嘉湖地区和宁波地区农村工业化要滞后一步,工业化的自然约束较严的浙西北、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从区域上看,温州和台州一带由于体制创新活跃和原始积累完成较早,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态势比较持续强劲。现代经济部门随着体制的辐射力向周边地区扩散。另一方面,浙江中部的经济活跃地区的辐射力向西南地区扩散。两者逐步连成一条线,组成了一条高增长带。浙江农村工业化中出现的比较出色的企业和企业家多半集中在这一地带。可以说,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工业化主辐射源是温州,主要受辐射带是浙东北地区和浙东南地区。区域对浙江经济贡献率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现象。

浙江现代化主导产业的上述特点使得工业对区域聚集度的拉动力较大工业要弱,这也决定了浙江的城市化道路的特点,即小城镇成为城市化的基本选择。对浙江的城市化发展的约束既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又有来自需求的约束。目前,大家从供给方面讲得多,认为浙江城市化水平低主要是城市化战略和政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是各种对城市发展的不合理约束才使得城市化水平提高缓慢。固然,浙江的城市发展落后有供给约束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认,浙江经济自身缺乏对城市发展的拉动力。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需求约束。从需求方面来看,分散于农村各地的小企业对地域性的要求不高。从企业自身来说,所谓的聚集效益或规模效益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和产品都不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产品市场约束不显著的农村工业化初始阶段,情况更是这样。对于小企业来说,小城镇足以满足生产和交易的区位要求,重要的是交通运输条件。浙江的轻型产业结构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迅速改变的,即使大工业、大企业有所发展,也未必会形成对浙江本身城市化的推力。在高速交通迅速发展,上海等周边城市的极化效应非常强大的情况下,经济运行和产业布局不可能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因此,推进城市化进程要求调整过时的战略和改革不合理管理体制,但是,需要培植支持城市化的产业群。这个任务更加艰巨,需要时间也更长。

### 三、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应该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共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在 2020 年前后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再过 20 年,浙江将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从现在起到那时,只有 20 余年的时间。能否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十五”是关键。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 (一) 战略问题

到 2020 年左右浙江省能否基本实现现代化取决于现代化战略是否科学与合理。在战略目标基本确定的前提下,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手段的确定非常重要。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迄今为止,浙江的现代化是无战略的现代化或者说战略形同虚设的现代化,是自发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活动的自组织机制。但是近乎无战略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古典现代化的翻版,带来了许多的问题,这里不加展开阐述。下一阶段的现代化,要求政府对其作较为全面合理的战略规划。在党代会已经确定战略目标的前提下,需要对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手段进行比较科学的定位。

浙江的现代化进程在今后的战略重点应该是以推进新工业化为核心,推进全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不主张简单地提工业化中后阶段或第二阶段的这种提法。理由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时代,工业化已经具有许多传统工业化进程

所不具备的新内容和性质。这种新的内容和性质不是现有关于工业化阶段划分的标准所能够概括的。此其一。其二,新工业化阶段对体制和政策的要求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是有很大的不同。对浙江来说,我们不仅需要传统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所需要的体制、组织和结构,更加需要适应新工业化阶段要求的制度与组织创新。所谓的新工业化指的是建立在知识全面应用基础上的工业化。简言之就是知识型工业化。它不简单的是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工业化(这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基本类型)。新工业化赋予“科教兴省”以全新的内涵,它涵盖了高新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与改造和知识型小工业三个基本内容。其中知识型小企业是知识型工业化的基本组织载体。要确立知识型主导产业的战略地位。战略步骤和战略手段也应该根据新工业化的战略重点的定位而重新研究。营造有利于知识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体制、政策环境是浙江下一阶段现代化的基本着力点。这方面的问题有待于深入探讨。

## (二)体制问题

改革开放前 20 年浙江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经济体制创新,而创新的根源在于民间经济主体的利益驱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浙江前一阶段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源。可以断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直接的物质利益动力将仍然是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浙江经济增长进入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疲软之势既有宏观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浙江经济自身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体制创新空间趋向狭窄。非正规制度创新带来的利益由于该制度的扩散或其他省区的创新模仿而变小。随着整个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浙江改革开放以后依靠民间创新形成的体制先发优势趋于减弱。在某些领域,其他省市区的创新已经走到浙江的前面。我们经常提到的投资环境问题不仅是硬件问题,更是一个软环境问题。其中体制滞后又是根源。在体制问题当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对待个体私营经济的产权限制或政策歧视。即使九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给予个体私营经济以比较明确的法律地位,私人企业家仍然心神不定。私人企业面临歧视性的经营环境使得私人产权的收益预期偏低。温州,这个早就名闻遐迩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乐园,私人企业家也有难言之隐。许多私有企业手持两种执照表明体制环境仍然不够宽松<sup>〔11〕</sup>。甚至浙江人引以为豪的乡镇企业也被迫“隐姓埋名”<sup>〔12〕</sup>。私有企业在税负、规费、贷款等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方面受到低于公有制企业的歧视性待遇。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将会影响浙江经济的活力和优势。对私有企业的法律保护和政策歧视之所以形成强烈的反差,原因还在于很多领导的思想受到束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氛围中,领导个人的观念是否先进,思想是否解放,对该地方的政策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经济学上说,一种受到严格管制的产权必然是一种不完全的产权。能否本着“三个有利于”原则解除对私人企业的管制性政策这是考验浙江省各级领导思想是否真正解放的试金石。

浙江目前面临的体制问题的第二个方面问题是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条块分割,部门本位,地方保护等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依然故我,没有解决。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根植于计划经济时代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的旧观念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围绕自主经营的企业提供优质的行政服务,不是这样的行政体制所能胜任的。行政部门的设立、职能划分和职权分配基本上不是服从于企业运行的内在要求,行政运行也是自我本位,不顾及企业的需要。因此,企业办事难,决策迟缓,不能及时把握市场机会导致经营失败的事情经常发生。即使企业的产权问题完全解决,如果行政管理体制不作全面改革,经济增长也是难以为继的。不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不合理的产权制度一样也会扼杀民间的创新活力。不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还会加大管理成本,导致各种本不该有的各种费用,加剧企业家的负担,恶化经营环境。

总之,对浙江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来说,在政策上真正为各类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提供安定公平的环境和调整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

## (三)人的素质问题

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竞争的关键因素是人的素质,或者以经济学术语来说是人力资本存量。浙江人的总体素质在全国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今后发展的要求,这样的素质又是远远不够的。素质问题的具体表现在:第一,行政管理干部的素质滞后于被管理者的素质。这是浙江省各级政府不能向企业家提供有效的管理服务的主要非体制原因。关键岗位官员的知识结构、观念类型、敬业精神不如被管理的企业家或其他群众。正如有些企业家在调查中所反映的,政府官员“应为而不为,莫为而强为”使很

多有利于企业、有利于经济的事情最后泡了汤,又使得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得以蔓延。其中,有利益方面的原因,但素质问题不可忽视。提高官员的素质比提高一般群众的素质更为迫切。

素质问题之二是浙江企业家群体的素质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乡镇企业经营的家族化倾向、宗法化倾向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倾向,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不过在企业家文化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家族化、宗法化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最终将导致企业经营的封建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大地上曾经涌现过一代又一代全国知名的优秀企业家,但是除了鲁冠球、冯根生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多数企业家在商海中沉没或者起起落落处于低水平循环状态。确切地说,浙江有若干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但是却较少有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企业家本身主观方面的因素。但主观因素还是最主要的,那就是企业家群体总体素质偏低。表现之一是文化素质低,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或较好的正规教育的新型企业家不多,对文化知识或正规教育的忽视使得企业家的决策视野受到严重限制,管理创新滞后于企业发展要求。表现之二是个人的素养比较欠缺。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中,被金钱、女色、毒品或因自身其他道德弱点而垮掉的不计其数。表现之三是企业家创新动机的弱化,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过探讨<sup>(13)</sup>。在浙江经济第一次腾飞中发挥了重要功能的乡镇企业家,他们的创新动机还主要是生计型的或是物质利益主导型的。创新的目的主要是个体的生存、发展和物质享受,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从理论上讲,停留在低层次的行为动机,容易得到满足,一旦满足,行为动力就会弱化。在经济创新领域,同样的道理也是适用的。如果一个人最初从事创新活动是为了而且仅仅是为了使自己和亲属过上好日子,那么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他的创新动机势必会衰竭。在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如何实现创新动机的升华,在高尚的人生观的指引下确立了更高的人生奋斗目标,不要在一定的物质财富前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一如既往,创新不止,成为新一代企业家,这正是摆在浙江企业家面前的重大考验。如果低层次的创新动机不能及时实现升华,那么,它将不仅不能满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可能转化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

素质问题之三是创业人才匮乏,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和教育内容的滞后使得受教育者失业的问题初露端倪。要推进高教改革,提倡创业人才的培养和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要以创业拉动就业。温州的就业负担之所以轻就是因为创业人才多,就业带动效力强。

因此,在浙江现代化的下一个阶段,投资于人的素质或者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十分重要。人力投资的主体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般来说家庭已经逐渐成长为熟练劳动力、技术工人或一般职员的投资主体。这方面基本上已经不存在投资主体缺位的问题,私营企业主的人力资本投资瓶颈也不在资金。需要政府干预的人力投资主要是以下方面,第一,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关键岗位的干部的继续教育投资,这部分投资由于没有在公务员的现有工资水平中体现,必须由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第二,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家的培训,这需要由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标准或要求。在西方国家,这部分人是作为公务员来对待的。第三,特殊行业的准入,要求对民间经营者的正规教育状况作出规定。第四,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力度要加大。在基础教育方面,教学内容的改革迫在眉睫,要进一步加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在学校阶段就要通过训练培养、端正学生的成就动机和创业动机,强化创业能力。总之,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加强浙江人的素质建设,尽早实现浙江人的现代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 (四)政府功能定位问题

浙江下一阶段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功能应该如何定位?政府的作用应该集中在哪些领域?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反思的问题。政府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是不容置疑的方针。不过对这一方针的理解需要根据浙江自身的情况,要实事求是。浙江省内各级政府是否还应该继续前一阶段关于政府作为的一系列习惯做法呢?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政府进一步退出经济领域是一种必然趋势,谁也无法抗拒。不过,是被动退出还是战略中心主动转移,结果截然不同。我们的看法是,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改善浙江省的投资环境。黑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曾经于1997年采用主要成分分析法,根据5类29个指标,对全

省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评分。结果,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山东名列前 5 位,浙江居第 6 位。得分广东 4.97、上海 3.49、北京 2.61、江苏 2.40、山东 2.21、浙江 1.96。浙江大学承担省十五规划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浙江省的投资环境状况与黑龙江学者的研究结果比较接近,主要的弱项在于吸引外资的效果不理想,在沿海省市区中最差。其中,硬环境中差项是交通,软环境中,主要差项在于以下方面,一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或高度不够,产业的引资能力弱;二是政策优惠度滞后于其他省份;三是政府对引资的规划不够;四是基础部门收费多且标准偏高,还有就是政府的行政效率较低。评分中打分者认为浙江省投资环境中政治因素不好的占全部人数的 54%,只有 6.7%的人认为优<sup>(14)</sup>。可见政府在改善投资和引资环境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第二,高度重视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浙江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各个省市区中位居后列,这一点不仅与浙江高速增长格局不相称,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要求相比也不相适应。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是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sup>(15)</sup>。因此,目前省委省政府以城市化为突破点推进下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是抓到了关键。

以上两个方面,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都是属于公共产品供给的范畴。这本来就是政府的基本功能。所以我主张下一阶段,浙江省要实现政府功能归位。

### (五)技术支持体系问题

上一个阶段,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是劳动和资本,经济的技术含量不足或者说技术进步贡献率偏低,是劳动密集型的高速增长。要维持这种高速增长,比较优势已经逐渐丧失。关系下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就是技术支持问题。技术进步呈现出收益递增的内在趋势,容易导致技术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如不尽早重视,未来会很被动。目前认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人已经很多,但是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技术支撑体系的建立是实现知识型工业化的基础。为此首先必须显著加大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力度,组建有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知识应用机制。其次要尽早关注和实现信息网络化,香港提出了发展数码港的大构想,浙江要迎头赶上。我们认为这方面工作已经刻不容缓。浙江大学已经启动“浙江大学科学园区”的计划,DMB(登攀)计划和蒲公英创业计划等发展计划,宗旨也是推进技术创业、知识创业的进程。第三,政府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形成自组织的创业机制的软环境。

但是以上五个方面问题当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体制创新。体制创新是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法宝。体制创新又依赖于不断的思想解放。因此浙江能否在下一阶段顺利地度过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全面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浙江能否继承和发扬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的优良传统,能否继续坚持求实创新的精神。

### 注释:

(1) 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 S.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版,第 37~91 页。

(2) 杨豫:《译者前言》,载《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 页。

(3)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动向》,载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9~98 页。

(4) 参 W.W.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 
- (5) 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 (6) 参金祥荣等：《组织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7) V.W. 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327～370页。
- (8) 哈耶克对传统在市场经济秩序扩张中功能作了较高的评价，汪丁丁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参哈耶克：《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 (9) 参见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第5章《制度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54页。
- (10) 参见“浙江现代化进程研究”总报告附录。
- (11) 孙裕：《一家私企为何手持两本执照？》，载《浙江经济日报》，1999年6月19日一版头条。
- (12) 孙裕：《乡企为何‘隐姓埋名’》，载《浙江经济日报》，1999年6月22日一版头条。
- (13) 罗卫东：《论中国企业家创新动机的升华》，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
- (14) 朱柏铭等：《浙江省投资环境及其改善研究》（内部打印稿）。
- (15) 罗卫东、许彬：《论城市化与浙江社会发展》，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